

DOI:10.16624/j.cnki.11-3844/d.2024.04.010

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张金才

改善中苏关系，是邓小平在外交领域继调整与日本、美国关系后，做成的又一件大事。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仅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维护国际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开启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

邓小平与苏联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年，他曾在这个国度留学。1956年至1963年，他曾多次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并在长达10年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由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

力，致使两国关系恶化，后来基本上隔断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在内外交困下，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苏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中苏会谈是中国在照会中主动提出来的。1979年8月22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方案的请示》。8月25日，邓小平作出批示：“以在政治局讨论为好。”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确定了我方谈判的方针和策略。

邓小平在指导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首先考虑并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的国家

利益，即不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1979年9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要消除中苏关系的障碍，这是谈判的前提。障碍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不只是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100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界的军队，至少减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数量。苏联在蒙古驻军能够继续吗？理所当然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要让苏联把军队从蒙古撤出去。还有，中苏双方都不在对方的邻国建立军事基地。苏联应该放弃支持扩张和霸权主义。1980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总统塞科，在谈到中苏两国进行的谋求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时再次指出：如果苏联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就要把驻扎在中苏边界的军队数量减少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水平。那个时候，在中苏边界只有十几个师。要消除改善中苏关系的障碍，这是一个前提。

对于中苏谈判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邓小平有充分的估计。1979年9月25日，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中苏谈判要谈起来看，也许是“马拉松”式的谈判。果不其然。谈判刚开始不久，就在1979年12月底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对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予以强烈谴责，并果断中止了与苏联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1980年4月20日，邓小平会见穆恩率领的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在谈到阿富汗问题时指出：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坚决

谴责苏联这个侵略行动。阿富汗是我们的近邻，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行动对世界构成威胁，当然也包括对中国构成威胁。我们谴责这个行动，支持世界上一切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行动。同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时又明确指出：我们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进行了新的谈判。阿富汗事件出来后，我们就中断了这个谈判，这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

对于何时恢复中苏关系谈判，邓小平持慎重的态度。1980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回答中国是否可能恢复因阿富汗问题而中断的中苏谈判问题时说：这要看阿富汗形势，也要看越南问题如何发展。中苏谈判不能只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因为两国关系恶化的因素不是孤立的。我们提出改善中苏关系首先要消除障碍，所谓障碍就是指苏联驻扎在中苏边界的100万军队和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驻军，另外还包括越南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搞印支联邦、侵略柬埔寨和老挝。1981年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外交战略方针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的口号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格局不要变。对苏联贸易可以维持一定数额，边界问题也可以有些接触，但涉及恢复两国关系的谈判就要慎重。没有出现新的大的情况（比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两国关系的谈判就不能恢复。这是一个大的姿态，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外交格局。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邓小平逐步提出了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原则和条件。

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讲话同时对中国的政策作了不少攻击。这篇讲话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随即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3月24日讲话作出反应。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表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除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话我们表示注意到了。我们的立场在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里都讲了。我们重视实际行动。邓小平同时请齐奥塞斯库见到勃列日涅夫时带话：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出他的军队也可以。先从一两件事做起。没有这样的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4月27日，他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举行会谈时，表达了对中苏关系的看法。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应该说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但要恢复正常化，看来现在也不具备条件。所谓条件就是苏联在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驻军与蒙古驻军问题上要有实际行动。

1982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和李先念、

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我们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谈到传递信息的方式时，邓小平指出：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赴莫斯科，向苏联副外长传递了中方建议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20日，苏联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随后，邓小平在驻地听取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和于洪亮汇报，并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10月，中苏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改善中苏关系的进程正式启动。

二、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中苏谈判的进展以及苏联领导人在双方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态度。1983年8月27日，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一行时说：昨天安德罗波夫发表了一个对外政策的讲话，讲话的末尾说，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能涉及第三国。这就把改善中苏关系的话统统推倒了。我们提出，要改善中苏关系，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它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摆了100万军队和1/3的

导弹，还在蒙古驻军，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这是第三国吗？所以通篇讲话中，仅这一句就拒绝了中苏谈判的基础。中苏关系的前景，我还看不出来。同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最近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有变化，过去讲两国改善关系不要涉及第三国，现在讲不要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解决中苏关系问题，毕竟还有三个障碍，谈判还是要继续下去。

在指导和关注中苏谈判进展的同时，邓小平持续向国际社会释放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愿意同苏联打破僵局、增加接触的信号，以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1982年9月18日，他在同金日成谈到中苏关系时说：在我看来，中苏谈判将是长期的。当然，我们还是愿意同苏联保持接触的。召开十二大之前，我们已答复了苏联，同意把两国之间的接触升格到副外长级。这是一个松动，当然一谈到实质性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10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中苏关系要改善，要正常化，首先是要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但中苏对话还要继续下去，不能设想两个国家永远这么僵持下去。12月15日，他在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夫伦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12月

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更加明确地说，关于中苏关系，我们非常赞成打破僵局，增加接触，我们也在努力增加接触。僵持总不是办法。

鉴于政治谈判进展缓慢，邓小平同意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与苏联在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增加接触，以利于推动中苏关系的发展。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只要苏联不在消除三个障碍上迈出一步，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变化。但既然是邻国，可以在其他领域改善和发展一些关系。这对于稳定国际局势有益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对苏联，政治上坚持消除三大障碍，不松口，经济上可以解冻，多做些生意。5月23日，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时指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差不多中断了十多年，但我们还是要同它改善和发展关系。中苏之间的贸易近年有发展，今后还会有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

发展。其他方面，如文化、体育交流都会有增加。尽管如此，两国关系正常化还是要消除三大障碍。10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即使一时不能解决，在其他的领域，包括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可以加强和发展我们之间的交往。

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苏在贸易、文化交往等领域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此，邓小平予以肯定。1983年4月29日，他在会见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同苏联的接触，已提高到外长级的会见。但现在还是国家之间的接触，而不是党的关系。这不是说，党与党不可以接触，但首先要解决国家关系，为此要消除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是小事。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中苏之间的交往增加了，贸易增长了。1985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时指出：我们现在在贸易、文化交往这些领域同苏联的关系有改善，政治领域的正常化还看不到迹象，我们在这方面有某种改善的迹象。同年8月1日，他在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中苏之间现在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有发展，人员交流方面有发展，而政治关系仍同过去的情况一样。至于党的关系，还提不上日程。

邓小平在推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进程中，一直强调要掌握节奏，把握好分寸。1982年10月1日，他在审阅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关于拟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苏中友协成立二十五周年活动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谈判还未开始，目前不宜派代表团，可由大使参加。”同年12月19日，邓小平在审阅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关于中苏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与苏联科技交流，不要一哄而上，先做一二件事，切不可多。饥不择食的精神状态必须避免。”

从1982年10月开始的中苏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磋商，由于在讨论消除妨碍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上分歧较大，谈谈停停，两年过去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表现出积极姿态。邓小平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走出僵局的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决定利用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访华的机会，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口信。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愿意去。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邓小平在请齐奥塞斯库捎带的口信中，明白无误地宣布，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情上做起。这一点邓小平之前已多次提到。1985年4月17日，

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腾斯前，回答了比利时记者提出的关于中苏关系的问题。比利时记者问道：到目前为止，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问题中，你认为哪一个最难解决？换句话说，对你们来说在哪个问题上你们最坚持？邓小平说，这三个问题同等重要。中苏关系要真正实现正常化，必须逐步消除这三个障碍，因为它们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如果说，同时消除这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看来，对苏联来讲，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做对苏联没有任何损害，苏联仍然能保持同越南的关系。如果苏联方面抱着明智的态度，就可以先从这件事情做起。次日，他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中苏关系时又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我们坚持消除三个障碍。三个障碍一下子消除很难，但是总应走出第一步。三个障碍消除都很重要。苏联人比较容易做而无任何损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

失的是，让越南人从柬埔寨撤出去。苏联整个战略态势对我们威胁很大。坚持消除三大障碍，就是要解除对我们的威胁。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真正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一大步，它对和平就作出了贡献。不管走的是哪一步，边界撤军问题、柬埔寨问题或阿富汗问题，对世界来说都没有害处。

1985年10月22日，齐奥塞斯库在保加利亚开会期间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邓小平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当即表示要予以认真考虑。11月下旬，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访问东欧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戈尔巴乔夫在谈话中强调两国关系应该完全正常化，恢复和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了两国最高级会晤的具体建议，作为对邓小平口信的答复。戈尔巴乔夫在答复中避而不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举行

中苏两国最高级会晤显然是不现实的。中苏关系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提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

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苏中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予以回应。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回答是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会晤时，邓小平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戈尔巴乔夫虽然在海参崴讲话中“有点新东西”，但并未触及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正常化仍是步履维艰。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回答是否计划访问莫斯科时说：访问的条件就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如果我真的去莫斯科，那是好事，说明柬埔寨问题解决了。看来希望不大。再过两三年我也走不动了。11月16日，邓小平在



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电视记者华莱士的采访

会见土井多贺子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说：我出国访问的任务早已完成了，不准备再出国了。但我答应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两年前我曾捎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和平的国家，我可以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他会面，这件事还能办得到。如果在两年内我身体还可以，就还能实现这个诺言。谈话再次表达了邓小平对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

对邓小平的这一表态，戈尔巴乔夫在11月27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苏联领导注意到了邓小平在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关于他准备与苏共中央总书记会见的愿望。这样的会见也是符合我们愿望的，会见可以在莫斯科、北京或其他任何方便的地方举行，但反对有任何先决条件。

针对戈尔巴乔夫11月27日与卡翁达的谈话，12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樱内义雄时强调，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邓小平



1987年3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指出：我上次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只是重申了我过去说过的话，如果苏联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到莫斯科或者苏联其他地方同戈尔巴乔夫会晤。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虽然他说愿意同我会晤，甚至说愿意到中国来，但是反对有任何先决条件。我的说法是有先决条件，就是苏联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为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中国方面抓住时机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苏联方面也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了切实努力，中苏关系出现新的转机。到1988年底，中苏高级会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年10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说：三年前托你带的口信看来有成果，中苏明年能够实现高层会晤。

三、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为给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1988年

底和1989年初，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接受他转交的戈尔巴乔夫的来信。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任务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个任务相当繁重，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太多，牵扯面太广，而且都不是小问题。为了开辟未来，也需要了解过去。不过有个限度，只是了解，不予纠缠，重点在于开辟未来。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过曲折，并且中断了二十几年。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意味着已经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首先要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要真正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邓小平指出：就我个人而言，希望中国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

的关系。我们同美国在“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同日本恢复了两国邦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与英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剩下的重大问题就是中苏关系问题，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应客人要求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留念。同日，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和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田曾佩说，消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已获得实质性进展。谢瓦尔德纳泽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问中国。

对于即将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予以高度评价。1989年2月26日，他会见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同美国和苏联改善关系一样，中国也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从1959年以后的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邓小平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随即，邓小平提出，我们也宣布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两位领导人再度握手。为了中苏关系的改善，邓小平进行了多年的努力。

会谈开始后，邓小平提到了给戈尔巴乔夫带信。他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

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但是三年前我们已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有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面了。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关键是要平等。

会谈中，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一个是近30年间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出，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过损害。从中国得利最大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关于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指出：“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1/3，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讲到这儿，邓小平说，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过去就结束了，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在今后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

时，邓小平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这次中苏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苏两党关系也随之正常化。中苏两国关系在经历了30年的长期隔阂后，通过这一次历史性会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邓小平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